

王育德《閩音系研究》的音韻學理論與研究方法論析

陳楷峯*

摘要

王育德博士（1924-1985）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先驅者，以建立臺灣民族意識為其畢生志業，同時也長年埋首於臺灣語的研究與推廣工作。身為一位語言學者，他所撰寫的博士論文《閩音系研究》是他在音韻學方面的重要成就，該著作從福建各地語言的方音差以及古今音讀的比較，進行音韻對應關係的分析，嘗試建構福建音韻體系的歷史音讀層次。

除了《閩音系研究》外，王育德其他的語言研究論述，像是〈十五音について〉、〈福建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等論文，對於福建語言的發展史以及該地區方言音韻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王氏對於福建音韻體系的實證基礎，係藉由系統性的分析而建立的。王氏推測的依據，以及他對語料的應用情形如何？王氏的研究方法與其音韻論的關係為何？都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本文要探討的課題，即王育德的音韻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包括他對語言資料的運用，以及進行各項分析時，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或方法論的限制等。筆者希望透過王育德的研究論述，能深入觀察他對臺灣語音歷時性發展的理解，並由他的語學研究成果與貢獻，呈現他在臺灣語學史的重要地位。透過方法論的探討，重建臺灣語學經驗的主體性，並透過王育德的學術成就，思考發展之可能性。

關鍵字：王育德、歷史語言學、《閩音系研究》、音韻論、文白異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王育德（1924-1985）是臺灣第一位閩語學博士（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2008，107-114），終其一生以研究臺灣語、建立以臺灣人為主體的歷史觀為目標，並以臺灣獨立運動為其畢生志業。王氏在日治時期曾就讀臺北高等學校（校址位於今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高校的學風自由，學生在讀書之餘，也能探索自己的興趣。王育德在高校時，除了自身對文學的興趣，加上兄長王育霖的影響，於是便開始研究歌仔冊、演劇等傳統民間文藝，尤其是對臺灣話的研究，影響他在戰後初期嘗試演劇創作的文藝活動。高校畢業後，王氏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支那哲文學部，終戰前後暫停學業回臺，直到蔣政權佔據臺灣、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王氏的至親遭到逮捕，使他有感於當時肅殺的政治環境而離開故鄉，再次東渡日本。王氏於東京大學復學，就讀中國文學語學系，學習漢語音韻學以及現代語言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師事倉石武四郎、服部四郎、藤堂明保，而這三位漢學家、語言學者，在當時的日本學界，皆以各自所代表的學術成就享譽盛名。

王育德重返東京大學就讀，在幾位教授的指導下，接觸了歷史音韻學及現代語言學等領域的學術研究，始能針對漢語音韻系統的歷史變遷，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王氏原先對臺灣話進行研究的興趣，和語言學的知識背景與專業訓練，得以匯聚一處。我們在王氏所撰寫的各篇論文中，都可以看到他運用所學的知識，來建立臺語發展史的主體性，例如：用來計算各地漢語年代分層的語言年代學，以及音韻學（包括語音的比較分析）、語法學等。王育德除了將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論，導入臺灣語的研究，而這位臺灣語學史上第一位閩語博士，在學術上的成就，也確立了他在臺灣語言學上的重要地位。

關於王育德《閩音系研究》的特點，中澤信幸（2022：26-27）認為王氏的音韻學觀點，與董同龢等人不同之處在於，比起語音系統上的解說，王氏則更重視實際的發音，並活用各種有關福建各地方言的先行研究，詳細地整理他所掌握的語料；而作為臺灣話的母語者，王氏對於自身母語的內在省察與理解能力，與母語並非閩語的羅常培、董同龢等人的研究相比之下則更具優勢，因而能從臺灣話的內部觀察更細緻的方言差異。儘管在實地的語料蒐集上有其困難，王氏仍根據有限的語料作合理的推測，乃是實證精神的具體展現。（中澤信幸，2022：35-37）

我們從王育德發表過的論文，諸如〈中国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学的試探〉（1960）、〈中国の方言〉（1967），以及〈福建の開発と福建語の成立〉（1969）等研究成果，則可以發現其研究課題都與語言發展歷史密切相關。（王育德、林彥伶等，2002：13-98、111-159、185-218）王育德如何研究臺灣話的歷史？而福建方言與臺灣話的關係，乃至於這些語言的形成背景、歷史變遷及分化的狀態等，透過王育德的音韻學研究，可以看到哪些特點或呈現方式？因此要將王氏針對同時性、通時性的音系研究，以及語言年代學、歷史音韻學等各方面的論述進行整理，由此探究其方法論的特點與侷限性。

本文參考的先行研究，除了前述中澤氏的論文，還有曾進民（2002）的碩士

論文〈王育德台灣語研究之成就〉，其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整體觀的視野，同時指出王氏研究方法上應改善的細節，有助於理解王育德語言學的大致內容。例如該篇論文提到，運用語言年代學方法進行研究時，需要注意同源詞的百分比、基本詞彙的選擇，以及語言接觸等三個問題，由於語言年代學將各語言當成直線演變，並未考慮語言接觸的「借用」現象，所以在判斷同源詞的時候就有必要慎重考慮（曾進民，2002：31）。除了語言年代學的部分，在歷史語言學研究方面，曾進民以對應列舉的方法呈現王育德研究文白異讀的情形，得知韻母的差異最大（曾進民，2002：56-59）；另外，又將文讀音的歷史分層及讀音的構擬做了大略的整理與描述：

王育德討論文白異讀時接觸到語言史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語言層」。所謂的「層」就是討論文白異讀中語言的異質成分如何形成及演變。王育德用閩語次方言的對比，提出閩語文白異讀的語言層（曾進民，2002：66）。

王育德認為文白層並不是單一層，而是各有次要層的存在，這觀點較當時研究漢語學者進步的看法，王育德可以說是第一個注意到閩語的語言層問題（曾進民，2002：66）。以上這些研究論述構成「王育德語音研究之成就」一章，是與本文的課題直接相關的先行研究。除了曾進民的論文之外，篠原正巳（1999：368-372）、許極燉（2001：194-226）等人對王育德學術研究的評述，也都提供理解王氏語言學的重要線索。

再者，就要提到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二〇一四年整理出版的《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其中收錄不少和王氏語學研究相關的研究論文，其中洪惟仁的〈台灣愛與台灣語的結晶——王育德著作〉一文，提到《閩音系研究》這部音韻學專著的特點，認為王育德是極少數注意到傳統韻書的現代語言學家，且王氏在利用已發表的方言資料時，都加以音韻論的解釋。另也指出，王氏透過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的研究方法，對各地閩語之間的遠近親疏關係進行分析，並證明了 Swadesh（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1909-1967，美國語言學家）與恩師服部（服部四郎，1908-1995，日本語言學家）的方法論，若是運用在閩音系的分析上，則較不可靠（洪惟仁，2014：103-104），也許王氏針對閩音系所提出的音韻論，是修正語言年代學方法論的關鍵。

王育德的論文要旨，在於透過共時論及通時論的研究，提出音韻論的解釋，以確立各地閩語方言漢字音的對應關係，同時並掌握臺灣話（臺南方言）與其他閩語方言之間的關聯性，進一步推定閩音系的歷史層次。王氏認為「文讀音和白讀音是兩個語言層，兩個層有嚴整的對應關係，否則便不是文白異讀，只是訓讀字」（洪惟仁，2014：104）。舉例而言，「山」存在「san」與「soaⁿ」的對應關係，就是文白異讀，而用「súi」讀「美」這個漢字，則是訓讀音。¹（王育德，2000：

¹ 此處說明本文使用音標的原則：如引用文獻資料的用法，則該處以其內容的音標為主，若否則以「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臺羅）為表記原則。

120) 根據《廣韻》及閩南韻書的記載，建立歷時的閩語方言音韻結構，並透過福建各地語音的比較分析，推論各地方言歷史變遷的狀態。洪惟仁進一步提到，王育德透過清理漢字文白讀音的「戶籍」，將那些戶籍不明的排除掉，以便了解文白之間真正的關係（洪惟仁，2014：104）。可見「對應關係」與王氏的音韻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這裡的「戶籍」反映王育德對於漢字研究的概念，明顯來自漢語音韻學，或者稱做聲韻學的研究方法。而這裡所指的戶籍，王育德曾在《台灣話講座》以「美」字為例說明，即「止攝、開口、三等、上聲、旨韻、明母」（王育德，2000：78）。這是傳統聲韻學描述漢字讀音的方式，如「住址」一般，明確指出該字特定的韻類、介音的有無及類別、聲調以及該字在廣韻（宋代韻書）中的讀音紀錄；至於字源考證的問題，王育德也如此批評缺乏音韻觀念的語源探究者：

專事學術文化工作的人，最弱便是音韻論，且泰半由於是弱點，故而不放在心上。缺乏音韻論常識的語源探究，可比是單翼飛行的飛機一般，危險之至，令人不忍卒睹（王育德，2011 [2002]：205）。

可見王育德認為，音韻學的概念對漢語史的探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王氏針對閩語系漢字讀音進行分析之主要目的，在透過福建語言複雜的文白異讀，以及語音層的對應關係，觀察並分析閩音系的歷史變遷狀態，藉此重構閩祖語，並釐清臺灣話（臺南方言）的形成與發展情形。而王氏所設置包括次要層在內的多個語音層，與他的音韻論有關。本文所要分析的課題，可分成三個面向：一、王育德音韻論中閩音系漢字音的對應關係有何特徵；二、王育德如何運用語言文獻，分析閩音系的歷時層次；三、王育德的口語（即臺南方言）與閩音系之間的關係。本文擬根據《閩音系研究》的內容，對王育德的音韻論述進行分析，旨在釐清王氏對閩方言的認識，以及他對閩音系歷史變遷進行分析的理論與方法。

至於本文的章節分配，首先要從王育德《閩音系研究》的論文架構，討論他對漢語音韻學的認識，同時根據王氏音韻論的探討，分析漢字讀音的對應關係在其論述中的角色；其次則是根據王氏音韻學論述，討論語言文獻在其中的位置，並透過閩方言音系與中古音的歷時音韻關係，分析王氏的方法論；最後，則根據王育德的口語，即臺南府城方言與閩音系之間的關係，分析王氏所視野中的古今漢字讀音變遷之對應關係。王育德的音韻論，是由上述三個面向的論述共同構成的。我們透過王氏對閩方言音韻體系的研究成果，整理並分析他的語學觀念及其中所蘊含的音韻理論及方法，而得以重建臺灣漢語學的發展脈絡。由王育德在戰後所開拓的學術路線，使我們看到臺灣歷史語言學發展至今，仍在持續發展、進步的原動力。

二、王育德《閩音系研究》所呈現音韻學的認識

王育德在一九六九年以《閩音系研究》作為論文題目取得學位，成為臺灣第一位閩語學博士。關於這部專論的研究題旨，王氏則開門見山地表示：「本論文是對閩音系進行共時論與通時論的研究」，使用了臺南、廈門、「十五音」(漳州)、泉州、潮州和福州等六種方言，作為比較分析的基礎語料(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論文要旨 13)。王育德的《閩音系研究》在內容的結構上，主要分成序論、本論與結論三部分，總共十個章節。王氏在序論部分，首先對閩音系各方言的分布情形，以及各方言的語言資料，做了概要性的簡介與評論，並在「親疏關係」的部分，透過語言年代學的方法，調查臺南、廈門、潮州和福州四個方言的親疏關係(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1-41)。

語言年代學的應用，目的在透過語詞(語根近似性)統計的方法，計算「殘存語率」，而此種研究方法，是來自恩師服部四郎教授的現代語言學，主要是為了推測各方言分化的時間區段，以及這些方言彼此之間親疏遠近的關係。如王氏所言「殘存語率的高低亦即代表親族關係的親疏情形」，而從計算的結果可知由親近到疏遠的關係為「台廈>廈潮>台潮>廈福>台福>潮福」(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47-48)，這就說明，臺南方言和廈門方言的關係，遠比與潮州方言或福州方言來得更接近；而同屬閩南系統的潮州方言，與閩東系的福州方言，則相去最遠。觀察此一結果，對於音韻系統歷史層次的分析，有參考的意義。

王育德的研究動機，在「探尋台南方言的淵源所在」(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9)為此則需觀察「共時的」閩音系方言的語音系統，並透過音韻論的分析，推測並建構出「通時的」歷時層次。王育德對閩方言的認識，與他所參考、使用的資料，決定了全書的論述方向。而王氏音韻論的研究方法，與他所參考、使用的語料有關，其中有不少是來自中國的研究資料。然而，在王氏之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多為各別方言的語料蒐集與整理，附之以大略的特徵描述：

從來的中國的方言研究，把單獨的方言跟中古音做比較對照，中古音的甚麼，在這個方言是甚麼，這樣好像是在堆砌表格。最後，則列舉方言的特徵，這樣就算完了(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論文要旨 15)。

王育德則認為，使用這些語言資料時，有必要先由他本人來加以音韻論的解釋，況且是要同時處理複數的方言，那就更需要以一貫性的音韻理論為基礎(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論文要旨 15)，藉以分析目標語言的音韻系統並建構其歷史演變的層次。語言學者對語音成分的觀察，包括對語料的掌握，對於音韻體系的研究來說相當重要，王育德就認為「音韻論是抽象的，像『對應法則』或『作業法則』等，並沒有各種個案的知識，大多只能默默地作筆記……。」(王育德、邱振瑞，2002：50)也因為音韻體系本身是需要透過語音系統的觀察來加以建構的，相比於語法的研究而言則更為複雜，必須根據現有的語彙，分析當中所含的語音成分，進行語音對應的比較分析，進而整理出構成這種語言或方言的

單元音成分，並從這些語言的音韻系統當中，歸納其聲母和韻母的音節組成形式，而這些音節的組成形式，就會影響各種語詞的構成，甚至是語法的研究。

可見音韻論 (phonology) 的分析，是在「對應法則」及「作業法則」等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的，只不過如王育德所言，正因為音韻論的研究方法是抽象的、概念的，所以語言學者本身的語言經驗、語學視野、觀察角度，都會影響音韻體系建構的方向。也就是說，臺南府城出身的王育德所提出的音韻論，必然會受其故鄉方言的影響，而這也是王氏將臺南方言列入音韻比較分析的參考語料的主要原因。所謂「對應法則」，是指語音結構的對應關係而言，在列舉目標語言或方言群的語音系統之後，針對其中性質的異同進行分析。此種方法的基礎，就如王氏的另一位指導教授，漢語學者藤堂明保所述：

音韻的語音特色，實際上僅限於區別其他音韻的絕對必要的特色。語音學的觀察雖說越詳細越好，但在音韻論中，只需要專注於對區分語音有用的條件即可。以這種方式篩選出來的，被認為是每個音韻的特徵所必須的發音特色，被稱為「音韻的特色音素」，而由這些特色音素所區分的類別被稱為「音韻論的對立」。(藤堂明保，1980：17)

就原理而言，語音的特色是由「對應」關係尋找「對立」的現象而來，如此一來音韻體系就會呈現完整的結構，同時我們也可以找到各別音韻體系中，具有識別性的「特色音素」，透過這些語音的變化，來推論整體音韻結構的歷史變遷，就能推測出特定音韻體系的發展脈絡；至於「作業法則」，服部四郎指出，這些原則主要是為了歸納音素（音位）的性質而制定的，其種類包括：同化的原則、分布的原則、構造的原則、經濟的原則等。(服部四郎，1966：283-300) 透過這些原則，考察語言的語音體系，進一步推測音韻結構變化的可能情形。而其中漢字讀書音（文言音）及白話音的對應關係，即是王氏探究「閩音系」結構的線索。而關於音韻學的方法論（研究次序），王氏則指出：

程序上，我們可以依漢字的「戶籍」，分聲母、韻母及聲調三個要素進行考察。漢字的「戶籍」指的是代表性的韻書『廣韻』（『切韻』）或『集韻』的反切。為期能更精密，要採取（聲母＋韻母＋開合＋四等）的分析表示法。除此之外，亦要採用攝（16 或 14）的範疇。(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31-132)

透過漢語音韻學的方法，根據《廣韻》或《集韻》等傳統音韻文獻所收錄的漢字讀音，整理並列舉這些韻書所收字音的對應關係，進一步探究閩音系各別方言的音韻特徵，並推測其歷時發展、變遷的可能狀態。而王氏為了提出精密的音韻論，將福建各地及臺南的方言，視為一個整體的音韻結構，針對其內在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作為探究古今讀音異同的前提。也就是以中古音的「韻攝」及「等

呼」的音韻分類原則為基礎，來觀察「閩音系」這個整體結構與中古音的對立關係，作為分析閩音系歷史層次的參考：

文言音也好，白話音也好，對字的發音應該是一樣的，只是傳承的時期與出現的環境不同而已。因而，在論及兩者的對應關係時，以中國音韻史的「原點」亦即中古音為基準，是理所當然的。以中古音為基準，來考察文言音與白話音的對應關係，正是閩音系的通時論的研究。（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31）

如王氏所言，閩音系通時論的研究，是要觀察文言、白話的語音對應情形，並以此確立閩方言音韻與中古音的演變關係。然而，與相對整齊的文言音比較之下，白話音的演變情形，則更為複雜。我們從白話音的各種別稱，如：「土音」、「俗音」、「解說」、「話音」等（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18），即可知此種讀音的性質，包括：口語的、通俗的、解釋的。而白話音的特徵，主要有兩點：其一，「通俗性」的口語，流通於各個社會階層，用語多變且同時受各地的風土民俗文化影響，而呈現成分多樣且不穩定的語音結構；其二，「解釋性」的白話音，易與「訓讀」混淆。也就是說，文、白語音的對應關係在直觀上不容易確認。

雖然王育德用了許多時間與精力在整理語料，但仍有不足之處，而影響了語料分析的精確性：「在最初的階段，在當做『訓讀』加以排除的字裏面，夾雜著真正的白話音。相反地，在當做白話音而保留下來的字裏面，會摻雜著『訓讀』，亦在所難免。」（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31）如前所述，白話音與訓讀的關係較不易區分，需要另外確認「真正的白話音」以便分析：

重要的是，盡量蒐集真正的白話音，哪怕多一個字也好。以真正的白話音為對象後，才能推出其與文言音的音韻對應法則。真正的白話音蒐集越多，其音韻法則也就越精密。（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31）

王育德認為，確認「真正的白話音」是探究文言音的音韻系統的前提，文言、白話兩者對應關係的建立，是使音韻法則更精密的關鍵。雖然音韻史（歷時語音學）的研究，也可以先針對特定音讀層（讀書音研究）或特定韻部（某攝某韻）進行分析，但在王氏的視角，閩音系就是一個結構的整體，因而設置閩音系的音韻法則，也是《閩音系研究》的主要目標：

透過法則的設立，隨着我們認識的加深，從那些從來就被排除掉的字裏面，把該撿拾的撿拾起來，從那些，從來就被保留下來的字裏面，把該剔除的剔除掉。一步步來修正法則，最後達成精確性。（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31）

觀察王育德對音韻學的認識，可知音韻法則在其語學概念中，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不同語言或方言的語音分布、音韻體系，存在可被調整的彈性，而會隨語料的掌握情形，而不斷修正。根據服部四郎教授的音韻論所提及的幾個「作業法則」，就有特別從「構造的原則」獨立出來的「破擦音（塞擦音）的作業原則」，這是為了「輔音音素組佔有主導位置的語言」所設置的原則。（服部四郎，1966：392-393）如果王氏對其音韻學的研究課題，沒有充分的認識，則難以應用、並修正其研究方法，而想要探究此種方法論的特徵及功能，包括可能存在的問題點與侷限性，則需討論王氏對語言文獻的使用情形，及其音韻學的研究次序，從中發掘他的音韻論所呈現的閩方言音系與中古音之間歷時性的音韻關係。

三、王育德音韻論當中的閩音系歷時音層分析

王育德音韻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建立在他對閩方言音系的語音分布，以及歷時音韻層次分析的語學視野之上。就研究次序而言，王氏首先根據音韻文獻的內容，探究閩音系與中古音的關係。依照漢語音韻學的「幫、滂、端、透、…」等聲母的代表字，以及「果、假、遇、…」等韻攝及其所屬的「歌、戈、麻、…」等次分類（含開合、四聲）的韻部，對漢字進行分類整理，再將閩音系「現代」方言的語音，填入各別韻部所屬的漢字，作為比較分析的參考資料。然後，王氏觀察各類別語音形式的特徵，並以中古音的音韻結構為基礎，在閩音系各別方言在其中的分布情形，進一步提出音韻論的解釋，並針對各別方言之間的內部差異，挑選這個「整體的」音韻結構當中的「特色音素」，發掘其中的歷時性演變成分。

閩南方言的音韻文獻，傳統上以「十五音」韻書為代表，王氏使用的是光緒庚子（1900）出版的福州集新堂木刻本《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明治二十九年（1896）出版的《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以及民國四十四年（1955）臺灣臺中市瑞成書局出版的石印本《烏字十五音》；至於粵東的潮州話，王氏使用李永明《潮州方言》（1959）；而閩東的福州話，則使用陶燠民《閩音研究》（1956）、藍亞秀〈福州音系〉（1953）等研究成果的語料（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9-11、98）。中古音的資料，則以《廣韻》、《集韻》與其他傳統字書、韻書作為討論、比較分析的基礎。需要注意的是，中古音的擬音，許多學者根據自身的語音分析理論，而呈現不同的分布狀態。光是聲母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學者的擬音，這也反映各派音韻學者的不同認識。（盧國屏，2010：177-178）

探究閩方言的歷史演變，筆者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切入點，其一，是外部的古今音比較，其二，是從內部的方言（及次方言）間，進行音韻歷史層的分析。前者是將閩方言與中古音視為兩個對立的音韻體系，從語音分布之對應結構分析兩者的演變關係；而後者則是將重點放在閩音系各別方言之間的音韻關係，分析閩音系所屬方言（及次方言）語音的歷史層次。就王氏的音韻論來看，是在中古音

的分類框架中，以現代閩方言的「演變結果」作為分析的材料，探究閩音系所屬各別方言的語音變化趨勢。

由於王育德在書中提出的音韻學論述非常多，本文由於篇幅所限，僅列舉部分音韻論的個案，進行討論。此處要先列舉「舌上音」（知、澈、澄、娘等聲紐）與「崇母、禪母、船母」（齒音全濁聲紐）兩組聲母為例，討論王氏音韻論的次序。在「舌上音」這組聲母中，王氏指出：「知母」主要讀 t，一部分為 c；「澈母」主要讀 t'，一部分為 c'；「澄母」主要讀 t, t'，一部分為 c, c'。（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57）列舉並觀察前述各聲母所屬音字的分布狀態之後，王氏分別描述這些語音現象在音韻論上的意義。如：舌上音「讀成 t, t'，意為跟舌頭音沒區別。此為其他音系所沒有的特徵。有 c, c'，意為齒上音與正齒音的區別消失了。不過可認為這是來自官話的借用形式」，若「白話音無 c, c'，即可以證明這個形式是新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57-158）

王氏指出，閩音系的舌上音（知系）與舌頭音（端系）的聲母在閩音系沒有區別，而齒上音（齒頭音）與正齒音的也沒有區別，這與羅常培（1993[1930]：56）對廈門音系的觀察一致。

閩音系裏，舌上音跟舌頭音沒有區別，這是學者常引用的「古無舌上音」的活生生的資料。但是，應以白話音為限才正確。文言音的層沒那麼舊。如認為與白話音同樣為上古音的繼承者（continuant），那是危險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58）

王育德認為，不能將文言音與白話音的形成，視為同源或同時的，而用「白話音」作為推定「官話的借用形式」的分界點，而白話層顯然較為古舊。雖然並不是全部的文言音都來自官話（官音），至少在王氏的音韻論中，白話音、文言音兩者的關係，是分析閩音系新舊層次的指標。王氏並解釋：「舌上音在中古音裏，為卷舌性的齒內音。閩人把它當做普通的齒內音模仿。結果，與舌頭音沒法區別。」（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58），在語言接觸的過程中，訛音、變讀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王氏將「舌上音與舌頭音不分」的語音現象，視為閩人的語音系統，受其他語言（外在因素）影響的結果。至於此種影響究為何時產生，王氏則指出：

關於舌上音，邵雍（1011~1077）的『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裏，出現跟齒上音、正齒音混淆的徵象。因此，我認為舌上音的塞擦音化，大約在宋代。閩音系的文言音可能是在這以前就已經借入了。（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58）

王育德透過語音對應關係，以及文獻資料的綜合觀察，分析閩音系的語音分布狀態如何產生、變化，由此推測外部語音系統對閩音系的可能影響。就音韻論

的視野而言，王氏概念中的文言音，似在唐宋時期被借入閩音、或是在閩人模仿之下產生的新語音層，與白話音有明顯的時間差。筆者認為，需進一步討論在閩語系當中，文言、白話兩層語音彼此交錯、互相影響的狀態。

而針對「崇母、禪母、船母」這一組全濁聲母，王氏指出，「崇母」主要讀成 *c*（仄聲字）、*c'*（平聲字），一部分讀 *s*（幾乎是「之韻」字），而「以閩音系來說，平聲字讀有氣音（*c'*），仄聲字讀無氣音（*c*），如此截然不同地分開出現，是在其他的全濁音裡看不到的。」因此才另外挑出來特別說明；至於「船母」的白話音，則不論平仄都讀成 *c*，王氏則認為這是有聲塞擦音的遺痕，而又比變成摩擦音 *s* 的文言音更舊。（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62）透過平仄讀音與聲母分布的關係，王氏對新舊語音的呈現狀態，提出解釋。此外，文獻的佐證材料，也頗具參考意義：

禪母與船母，於『切韻』的時代，在江東的方言裏已經沒有區別了。這從『顏氏家訓』『音辭篇』有「南人……以石（禪母）為射（船母），以是（禪母）為舐（船母）」的紀錄可以確認。（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63）

在語音演變的歷史過程中，語音的混同存在不可逆的趨勢，王氏舉出中國南北朝時期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的例證，說明江東（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方言，尤其「禪母」與「船母」兩者混同的現象，在中古時期已然可見。而此後的唐宋之際，混同的情況則更明顯：

唐代以後，兩者的混淆〔淆〕有全國性的傾向。在慧琳的『一切經音義』的反切也好，唐五代西北方音裏也好，其區別都完全消失了。因此，閩音系的文言音自不待言，連白話音也傳承了被混淆的狀態。（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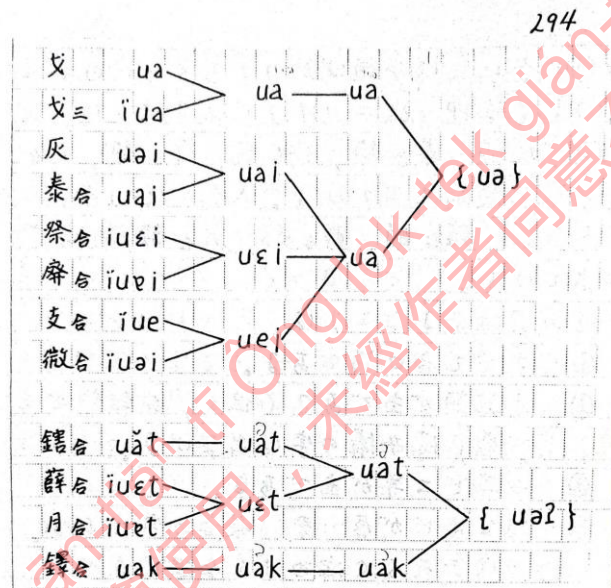
王氏透過語音的對應關係，反覆考察相互對立的古音與今音，而較晚近的文言音又似透過模仿、借用而來，進而形成與白話音不同的層。筆者認為在概念上，古音存在的前提，是因為今音的存在。越是整齊的語音對應結構，則越有機會推測並掌握語音演變較可能時間點，乃至於音韻層次的時間差。可以想見，閩音系各方言語音層的發展脈絡，確有其複雜的狀態。至於韻母部分，則先從「果攝」的「合口一等戈韻」為例，討論王氏對此韻部的語音分析。

觀察閩音系的「合口一等戈韻」在牙、喉音（《、ㄅ、ㄆ）的「科、火、窩」等漢字的發音，廣泛出現：*ue*（台南、「十五音（漳州）」、潮州）、*e*（廈門）、*ə*（泉州）、*uoi*（福州）等音。（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95-196）於是王氏便指出：

這些字詞裏面可能有一種本來的形式——暫且稱之為「共同基本詞」。「共

同基本詞」可能是{uə}。比較忠實於「共同基本詞」形式的是「十五音」(漳州)。 ə 變化為 e ，其結果成為 ue (漳州無 ə)。台南與潮州承襲了漳州的系統。泉州是 -u 消失了的形式。廈門承襲了泉州的系統， ə 訛化成為 e 。福州則 ə 分裂成 oi ，其結果變成了 uoi 。(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96)

王育德透過音轉的概念，針對閩音系的語音分布狀態，提出所謂「共同基本詞」的名稱，用來解釋閩方言的語音差異，並針對閩音系的演變趨勢做了說明。由王氏對語音變化的解釋所衍生出來的，便是中古擬音到「共同基本詞」{uə}及其入聲表現{uəʔ}發展脈絡的推測(括弧{}應為王氏擬音)：



(圖 1) 共同基本詞{uə}與{uəʔ}語音發展過程圖
(資料來源：王育德，1987：294)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點，是在「假攝」的「開口三、四等麻韻」中，文言音都是 ia ，出現的方式實在很整齊一致。根據王氏的觀察，在這些形式的詞素裏，既有純粹的文言，也有「既是文言也是白話」的語音。於是， ia 韻被認為是固有的，同時也是新借入的形式，兩者重疊在「邪、奢、夜、……」等字的文、白語音系統中。(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08-209)

綜上所述，王育德對閩音系歷時語音層次的分析，是根據各別韻部的語音分布所呈現的「對應關係」來制定相應的「作業法則」，並提出符合語音變化規律之音韻論的解釋。而王氏在掌握語言資料的同時，配合文獻資料提供的資訊進行推測。原則上，我們是透過語言學者的音韻論中的每一組語音，以及這些語音的發展狀態，看到音韻結構的整體。因此我們需要提問：王育德如何透過音韻學的研究方法，將其故鄉臺南的方言，與閩音系建立歷時的連繫，是考察其音韻論之重要課題。

四、王育德的臺南方言與閩音系的歷時語音關係

音韻學的方法論，原則上受到語言學者的語言經驗及語學觀念等兩大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樣態。因此我們有必要將王育德所使用的方言，當作音韻論視野的主體加以分析，才能掌握王氏音韻論背後的思考方式。王氏出身於臺南市，他所使用的方言自然是府城的方言。而王育德在一九五七年自費出版的《台灣語常用語彙》可說是戰後第一本以臺南方言為中心所編纂的常用辭典。在王氏之前研究閩南語的學者，多以廈門話（羅常培、董同龢）或者臺灣話的臺北次方言（日本時代的研究者）為對象，因此筆者相當肯定王氏的開拓之功。

理論上，口語是白話音的基礎，同時也影響了文言音，以及各個語音層當中，借自他語言（如官話或吳音系）的「倣聲字音」的表現形態。如果再加上時間、環境等因素，則白話音的表現形式，則將更為複雜。在此認識之下，可知《閩音系研究》就是在臺南方言與其他閩方言之間的「共時」與「歷時」的語音關係的基礎上，並根據傳統韻部分類法，提出音韻論的著作。在討論這部著作時，在王氏的語學視野中，「口語＝白話音＝臺南方言」的關係，不得不多加留意。首先要注意到「臺南方言與漳州方言」兩者的關係，在資料方面，王氏使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作為漳州系語音的代表。王氏指出：「尤其是有關漳州，有『十五音』這個好資料，是要加以利用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9）這本通俗韻書刊行於一八一八年，收錄約一萬五千字。

從那裏擷取的漳州音韻，正確地說，是 150 年前（筆者按：距今約 200 年前）的發音。雖說與辭典所記載的大致上並無出入，仍必需加以注意。在此，吾人不將它稱為漳州方言，而盡量稱它為「十五音」，就是因為考慮到這點的關係。（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9）

雖然「十五音」時代的漳州方言，發展至今大致已經定型，然而文獻紀錄終究有別於口語。由此可知王氏對資料運用的謹慎。我們看到「山攝」的「開口二等刪、鎋韻」（圖 2）這組韻部的字音經過語音比較，王氏發現在「開口二等刪、鎋韻」的「辦、板、間、閑、八、拔」這組字音當中，在臺南、廈門及「十五音」裡的舒聲（非入聲）出現的 $iəŋ$ ，需要特別提出討論。（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353-356）

	台南	廈門	十五音	泉州	潮州	福州
辦	pian ²	pian ²	pian ²	pian ²		
	pan ²	pan ²	pan ²	pan ²	poĩn ²	peŋ ²
板	pan	pan	pan	pan	paŋ	
					poĩn	peŋ
間	kan	kan	kan	kan	kaŋ	kaŋ
	kiaŋ	kiaŋ	kaiN	kaiN	koĩN	
閑	han	han	han	han		
	iaŋ	iaŋ	iaŋ	aiN	oiN	eŋ
八	pat,	pat,	pat,	pat,		
	pe?	pue?	poi?	pai?	poi?	pek,
拔	pue?	pui?	poi?	pai?	poi?	pek,

(圖 2) 閩音系「開口二等刪、鐸韻」語音對應圖

(資料來源：王育德，1987：535-536)

王氏認為陰聲韻{əi}及入聲韻{əi?}，都可以從臺南、廈門及「十五音」，整理出與泉州、潮州、福州的對應形式，於是推定鼻音的{əiN}也應是如此，並整體圖表如下：

	台南	廈門	十五音	泉州	潮州	福州
{əi}	e	ue	{ ^e oi(又音)}	ai	oi	e
{əi?}	e?	ue?	{ ^{e?} oi?(又音)}	ai?	oi?	ek ⁽³⁾
{əiN}	x	y	z	aiN	oiN	eŋ

(圖 3) 閩音系擬音{əi}與{əi?}語音對應圖

(資料來源：王育德，1987：537)

王氏認為，圖中的 x=eN，y=ueN，z=eN/oiN（又音），而 iaŋ 的發音卻又出現在 x、y、z 三處。於是王氏推測，前述這些閩方言字音的[-ŋ]，實際上是

由[-N]派生出來的，所以原來的 eN 就變成 eŋ 或 ɛŋ，而 eŋ 在體系上又可以被解釋為 iaŋ。(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355-356) 並以「臺南當然不過是承襲了『十五音』(漳州)系統而已。廈門大概也是忌避困難的泉州發音，而模倣了漳州的發音」作結。根據此處王氏的音韻論，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重點：首先，在整齊的音韻體系中，不符合語音對應關係的字音，則視為優先分析的語音個案；其次，前述「臺南與潮州承襲了漳州的系統」的概念，能在不同韻部反覆驗證。而在這個「閩音系」的大結構之下，可能存在「以漳洲音系為共同來源」的次結構(漳州、潮州、臺南)，並與偏泉系的泉州、廈門方言相互對立。

再看到臺南與潮州兩個方言的關係，關於的匣母字的「航」，王氏指出，在臺南，「航海」(行船)讀成ɕhaŋ ɕhai，而「航空」(飛行)發成ɕpʰaŋ ɕkʰoŋ 的人較多(作為文言性的白話常被使用)，這是相當有趣的現象，就如王氏所述，潮州與臺南幾乎沒有交流，要互相產生影響的是可能性不高，可說是偶然的一致。(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181) 如果臺南與潮州的方言，就像王氏說的，都受到漳州方言的影響，則此兩者的關係，亦有值得推測之處。如果查《新潮汕字典》，則可以看到「俗音」，確實有收「pang⁵」。(張曉山，2020[2010]：645) 再說「航空」一詞，想來也不會是近代以前的用語，如果分別出現在臺南與潮州的白話音，可能就與兩者內部的語音及詞彙系統有關了。王氏則如此推測：可能是臺南與潮州的人，對於「船航行時須使用『篷』」有同樣的想法，於是將「篷」字(ɕpʰoŋ：ɕpʰaŋ)的白話音拿來讀「航」字。這是出於音韻論的認識，所做的可能性推測。

如果再進一步討論，根據「效攝」的「開口一等豪韻」，分析潮州方言的變化規律，據王氏所述，「豪韻」au 在潮州系統中是具優勢的，且白話音較文言音更佔優勢。而在閩南，零星出現的 au 形式，則明顯為白話音。王氏指出「這個形式由於有廣母音 a 的出現，與 u 韻尾還健在，可以說比較忠實地在反映中古音」並提到此韻在慧琳《一切經音義》、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宋代的汴京與洛陽音等都是 au 的形式，可能是由關內方言圈移入的開拓民，傳入閩音系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95-297) 因此王氏將此情形推定為「官話借入」的形式，並認為：

潮州從閩南方言分離出來後，雖被客家縣所包圍，卻形成一個獨立的方言圈。其間，當然會走上自律性的音韻變化。就一個個的漢字來說，以前有可信賴的權威漳州，現在沒有了。代之而向官話求取權威，從官話大量借用進來，則是非常有可能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97)

這就是說，潮州方言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與閩南的漳州方言脫離，而必須用借用他語音系統(官話或其他)的形式，才可能有如此特殊的狀態，畢竟「潮州的 au，如果全都是真正的白話音的話，那麼廣泛地出現於潮州的，卻沒在閩南出現，委實很奇怪。」(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97) 看到了這一層

的語音差異，王氏透過潮州方言所呈現獨特的語音表現形式，提示了尋找「真正的白話音」的方法，並以此判斷白話音當中的借用形：

就潮州來說，要分別出哪個是真正的白話音，哪個是新的借用形，並非難事。與閩南同形式出現的，是真正的白話音，而並不出現於閩南的，則是新的借用形。這樣的看法大致上好像不會有錯。（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298）

也就是說，閩音系作為一個整體結構，其所屬各方言的語音表現，理論上要有一致或類似的形式。以此種思考為前提，意即這個音韻結構，在不被任何可能因素，例如前述「將關內方言帶入閩南地區的開拓民」，的影響之下，在此結構中的每組語音，都會呈現同樣或類似的演變趨勢。然而，歷史是充滿變數的，而受歷史與環境條件影響而發生變化的語言，在產生不同語音層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借入、取代、新舊層重疊等各種語音現象，使得研究者在提出音韻論的同時，需要考慮更多面向且更細緻的不同因素。

觀察《閩音系研究》的結論，王氏在「stratification」（階層）一章，指出「閩音系是由文言音與白話音這兩個大的層所組成的，當初者種推斷並沒有差錯。但在仔細考察後，便知道比想像的要複雜得多了。」可以說「文白異讀」的語音，是王氏在深入探究閩音系之前的基本認識，但在進一步討論後，王室認為實際情況更加複雜：「不论文言音與白話音，除了明顯可見到的基本層以外，另有小的次要層。」此處提到的「次要層」，分別在聲母、韻母中，呈現不同程度的複雜面貌，且就程度而言，「聲母不如韻母、文言音不如白話音」複雜。（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535）

王氏接著以臺南的情形，整理出聲母、韻母的各別層次。就聲母而言，王氏設立了 A, B, C, D 四個層，並將 B 層視為白話音的基本層、文言音的基本層則移到 C 層，為了看起來比 B 層更舊的形式而設置 A 層，同理，為了看起來比 C 層更新的形式，設立了 D 層；至於韻母部分就比較複雜，王氏設置了 A, B, C, D, E, F 六個層，E 層相當於文言音的基本層，F 層則是為了後來被認為是從官話借用形式而設置的，通常當作白話音處理，以 B, C, D 三層來構成白話音的基本層，最後，則將不屬於任何形式的置於 A 層，表示在基本的三層之外，還有次要層的存在。（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536-543）為什麼韻母的基本層會有三層呢？因為王氏以 D 層作為中古音到現代音之間的過渡層，正是他根據音韻體系觀察，所擬的{ə}{uə}{əi}{uəN}等四種語音形式而預留的。（王育德、何欣泰、許極燉，2002：542）只不過這些分層，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固定的，只是就現有的音韻論考察的結論，暫且推定如此而已。

至於「閩祖語」的再建構，王氏則指出「因為文言音大致上是 synchronic（共時的）。其具體年代，從一開始就預測是唐末五代，因為如果是這個年代的話，可參考的音韻資料也很多。」只不過，王氏也自陳，雖然把「閩祖語」再建構起

來，是他原本的目標，然而遺憾的是，還有很多未能夠完全研究清楚的地方。我想這也是王育德在一九八〇年左右，向時任臺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的黃昭堂（曾是王氏在臺南一中教書時的學生），請示希望有更多時間修改博士論文的主要原因。（黃昭堂，2002：總序3）遺憾的是，王育德教授於一九八五年過世，而他的這部學術著作，堪稱閩語音韻學代表性的先驅，則留待後學繼續鑽研。

五、結語

王育德音韻學的專著《閩音系研究》是以探究其故鄉臺南的方言演變的歷史為主要目標。臺灣話的方言分布相當複雜，在日本時代已有學者做過詳細的調查，各地區都可以看到偏漳、偏泉的影響。王氏將其方言（口語）視為偏漳州系，而用傳統方言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所收語料，作為漳州方言的代表（王氏認為「十五音」與現代方言差不多）。重視口語及早期文獻並加以綜合運用，能在有限的參考資料中，對目標語系進行充分討論，可謂王氏音韻論的特點。

歷史音韻學的研究，是建立在研究者對目標語言的音韻結構，所呈現的語音系統及其分布型態的認識與理解之上，進而推測語音變化的狀態與趨勢，而這也是王育德研究方法的基礎。王氏根據閩音系的六種方言（臺南、廈門、十五音、泉州、潮州、福州）的漢字音，在中古音的各個聲紐及韻部當中的分布情形與呈現方式，根據這些漢字音的異同，分析古今音的演變形式。由於閩方言的文言音、白話音的異讀層次非常明顯，因此可作為比較研究的基礎。王氏將閩方言當作一個整體的結構，並透過閩音系整齊對應的音韻結構，探究其歷史演變的情形。

本文根據王氏的音韻論，討論他對閩方言不同語音的觀察與研究，分析其學術視野當中的閩音系，究竟呈現何種音韻結構，以及結構的語音對應的歷史形成因素應該如何觀察。雖然音韻論有其科學性的原則跟次序，然而筆者認為，研究者本身的語言經驗及與學觀點，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如同日本漢學家會特別注意日本漢字音的性質，臺灣的漢語研究者也會將臺灣的漢語視為分析的主要課題。就王氏的音韻論而言，臺南方言與閩音系各方言的關係，就是值得討論的觀察點。

經過語音系統的觀察，王氏將潮州方言與臺南方言，都視為偏漳州系的方言，這除了語音表現的外在形式之外，筆者認為這與地緣因素也不無關聯。畢竟就閩南、粵東的開發史而言，泉州開發後的下一步就是漳州跟潮州，而在漳州開發後，影響了潮州、廈門與臺灣（由南而北開墾）的語音系統。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條件，都是影響語音變化的重要因素，如果能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就有機會修正學術觀點，而能夠提出更完善、符合學理的音韻論。

有趣的是，個別方言在部分韻部當中，也會有強弱程度不等的語音表現，例如潮州方言在效攝的豪韻 au 就有較明顯而突出的表現，王氏於是將此作為「借用形式」來理解。可見個別方言獨特的語音表現，使研究者需同時考慮借用、做聲、訛音的情形，對音韻結構的影響。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舌音、齒音是變化較多的發音部位，可以看到較豐富的語音形式，因此本文以這兩種語音為例。

本文除了呈現王氏音韻論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觀點，目的也在重建臺灣語學經驗的主體性，透過方法論的探究，追尋臺灣語學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學術傳統。分析王育德的學術成就，並且重新思考這位前輩學者對臺灣語學發展的貢獻。在肯定王氏在臺灣語學史的先驅地位的同時。筆者作為學術後進，也得此機會向他學習，藉由王氏的學術理論，思考今後臺灣語學發展的可能性。

六、徵引文獻

- 王育德，1987，《台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東京：第一書房。
-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台灣話講座》，臺北：前衛出版社。
- 王育德著，林彥伶等譯，2002，《福建語研究卷》，臺北：前衛出版社。
- 王育德著，何欣泰譯，許極燉監譯，2002，《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
- 王育德，2002，〈懷念藤堂明保教授〉，收於王育德著，邱振瑞等譯，《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49-53。
- 王育德，2011[2002]，〈落入漢字的陷阱〉，收於王育德著，李淑鳳等譯，《台灣語研究卷》，臺北：前衛出版社，二刷。
- 中澤信幸，2022，〈王育德の閩音系音韻体系再考—『閩音系研究』第 3 章—〉，《山形大学大学院文化創造研究科社会文化システムコース紀要》，第 19 号，頁 25-41。
- 服部四郎，1966，〈音韻論（1）〉，收於《語言学の方法》，東京：岩波書店，三刷，頁 279-301。
- 洪惟仁，2014，〈台灣愛與台灣語的結晶——王育德著作〉，收於施俊州主編，《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頁 96-110。
- 許極燉，2001，《台灣話流浪記》，臺南：金安文教。
- 張曉山，2020[2010]，《新潮汕字典（精編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黃昭堂，2002，〈王育德全集總序〉，收於王育德著，何欣泰譯，許極燉監譯，《閩音系研究》，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1-3。
- 曾進民，2002，〈王育德台灣語研究之成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主編，2008，《台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盧國屏，2010，《聲韻學 16 堂課》，臺北：五南圖書。
- 篠原正巳，1999，《続台湾話雑考 日本人と台湾語》，東京：株式會社海風書店。
- 藤堂明保，1980，《中国語音韻論—そ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光生館。
- 羅常培，1993[1930]，《廈門音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一版。

The analysis about the phonetic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of Ô ng Iók-tek's “*The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okkien Languages*”

Abstract

Dr. Ô ng Iók-tek (王育德, 1924-1985) is a pioneer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 put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up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ese through his life and bared himself into the research about Taiwanese language(Tâi-gí) and engage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language in the long term. As a linguist, his PhD Thesis “*The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okkien Languages*”, which was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his academic works. The book compared the different regions' dialects and diachronic sounds between each Hokkien languages, trying to analyze the correspondence relationship of phonological system which was used to build up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okkien Languages.

Except “*The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okkien Languages*”, professor Ô ng furthermore published other papers, like ‘*About the Sip-ngó-im(十五音)*’, ‘*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 and the formation of Hokkien languages*’, and ‘*the phonetic systems of Chin-chew dialect*’, etc. Ô ng's basic evidence toward the Hokkien phonetic sources, which was built up by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okkien Languages and the phonetic system of each dialects in these regions. How did Ô ng speculate and use different materials?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Ô ng's research methods and his theory of phonology? Both are worth to discuss and step into the detail.

The topic I'd like to discuss in this thesis i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Ô ng's research on phonology, including his use of linguistic materials, also problems or limitation he encountered during his analyze. I wish to go through the detail of Ô ng's research discussion, and to observe deeply that how he understood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pronunciation. To present Hi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nguistics, through his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on linguistic research.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linguistic experienc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ies, and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through Ô 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Ô ng Iók-tek, “*The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System of Hokkien Languages*”, phonology, variant pronunciations of reading and speaking, historical phonetic research